

转型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的“异化”^{*}

——对一个县级职业高中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马学军

提 要：职业教育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对个人技能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占职业教育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自转型时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并没有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基于一所县级职业高中的田野材料，试图把职业学校面临的招生升学和培训实习的困境置于宏观的历史制度背景和微观的学校运作机制中，分析其所处的教育体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变迁，逐步形塑了当下的办学困境。作者认为职业高中在目前并未为学生提供一条不同于高等升学的职业道路，也未培养出适应于企业生产的技术工人，而是在地方承担起管理大量“学困生”的任务，以致学校既不以升学为重心，也不以培训为重心，越发陷入以“安全管理”为重心的异化境地。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 教育体系 经济结构 安全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的班主任是全县最辛苦的。县两所高中（县重点高中与职业高中）相比，我两边都呆过：县高基础好，管理责任少，主要以教为主；我校管理任务繁重，课时任务轻，值班任务相对较高。他们以教辅为主，我们以管理为主。我们管不好，家长不满意，学生招不来，学校就没法生存了……现在，我们的管理有许多特点，各级赞不绝口，风气影响很好。之所以学校管理这么严格，是因为学生基础差，经过严格管理后，以后他们走上社会，走进工厂，企业和

* 本文是笔者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文章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方慧容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白中林、孟庆延等同门师兄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的纰漏之处，皆由本人负责。

社会都比较满意。”^①

这是本文所研究的 H 县职业高中^②的一段田野材料。由校长讲话可知，该校目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教学，而是管理，并且家长和企业都比较满意这种管理。“安全第一，纪律第二，卫生第三，学习第四”这是学校领导和老师心中的共识。在该校，学校对老师和学生有一套极其细密的管理规定，如坐班签到、值班巡逻、层级检查、请假登记等等。这样的纪律管理深入到校园和班级的每个细节，时时强调，处处执行。班主任要从早到晚跟着学生，守着学生，防止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该校班主任的工作作风被形容为“勤跟苦守”。

学校名义上是“H 县职业高中（中专）”，实行高中升学和中专职业培训两种办学模式。但事实上，学校的本科升学率多年仅仅为 10% 左右，绝大多数学生升学无望。学校除几间陈旧的计算机教室外，并无任何培训设施和实训基地^③。这样看来，该职业高中在“职业”和“高中”两方面皆名不符实。作为一所职业高中，既不以考试升学为重心，也不以职业培训为重心，既不是完全的普通高中，也并非技术学校，反而却是以“安全管理”为重心，看似非常悖论。究竟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形塑了这样悖论的事实呢？

职业高中这种学校类型，是改革开放刚起步时，国家为适应经济发展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在中等教育改革中，将一部分农村的高中改办而来的。此后，尽管国家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企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也日趋增加，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础却一直薄弱。资金投入低、专业师资缺乏、招生数量下降和培养能力不足是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2007）。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④，包含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三种办学形式，其困境和问题尤为明显。这三类中等职业学校中，技工和中专这两类学校一直隶属于国家部委或国有企业，直至 1998 年才脱离国家计划保护而归属地方省市管理（杨金士，2002）。相比之下，大批由普通高中改办而来的职业高中，并未能像技校和

① H 县职业高中校长，“在全校班主任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2009 年 4 月 15 日田野笔记。

② 出于研究规范，本文所涉及地名、人名和企业名称皆做了技术处理。

③ 据后来了解，该学校于 2011 年兴建一所实训大楼，但供实训的教室仅有几间，并且师资设备迟迟没有配备。

④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组潘晨光等人的调查报告，2004 年，我国职业学校中，中等职业学校占 90.16%，而高等和初等分别仅占 5.44% 和 4.40%。中等职业学校可以说是职业教育的主体。

中专学校那样享受国家计划的保护，也最易受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一所县级职业高中的田野调查，试图把职业学校面临的招生升学和培训实习的困境置于宏观的历史制度背景和微观的学校运作机制中来考察，以解释我国转型时期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深入理解中等职业教育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的这所职业高中成立于1983年。该校的前身为1981年创建的“城关完中”，1982年改为“城关高中”，根据国家有关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指示，1983年该县把“H县城关高中”改办为“H县农林高中”，在1987年又改为“H县职业高中”，1993年再改为“H县职业高中（中专）”，此后校名一直未变。21世纪伊始，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职业教育新的政策，把学生送到东南沿海工厂，进行“顶岗实习”^①。从学校校名的变化，可看出学校的职业定位深受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影 响。这所县级职业高中，尽管具有某些特性，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办学形式，其目前所遭遇的招生、实习和管理困境是很多职业高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这种困境和所处的教育体制、经济结构和地方社会的变动紧密相连。因此，本文要解答的问题是：职业高中所处的结构性因素在转型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怎么相互交织形成了目前的困境？

二、研究回顾

近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产生于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逐渐成熟，成为西方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教育体制分为学术型教育（academic education）和职业型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两类。学术型教育为学生进入更高一级学院或大学做准备，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而职业型教育为学生能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学生毕业后可能获得地位较低的职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人生轨迹（Shavit & Muller, 2000）。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的职业教育体制实际都面临着一种困境：一方面如果想达到入学机会的平等，就需为学生提供同等的学制、课程、班级和受

^① 2005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职业学校学生在最后一年要去企业参加“顶岗实习”。

教育机会；而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考虑到不同的学生毕业后会选择不同的职业，就需要为学生开设不同的课程，以适应多元的劳动力市场。这样，就出现了教育的平等和分化的矛盾。教育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呢？不同的学者对此给出了不同的理解。

面对 18 世纪末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失范”，涂尔干认为应当以一种基于世俗道德之上的道德教育重建道德伦理，整合社会。在他看来，世俗道德由纪律精神、对社会或群体的依恋、道德的自主性三大要素组成。而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孩子们习得相应的道德因素。纪律精神可以培养儿童对规范的态度；对集体的依恋则可以超出自身狭隘范围，构建公共精神；自主性要求儿童自主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一种内化的社会态度。只有建立这三种观念，现代道德才得以形成，现代社会才得以可能（涂尔干，2006a）。当时代不断变迁，传统教育体系在多方面与现实的观念和现实需求不相吻合时，就必须反思当前的教育体系，寻求现代的教育理念和未来出路。随着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变迁，16 世纪的法国已经面临教育和道德危机，现代工业社会的来临更加剧了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尤其是中等教育改革更为突出。因为中等教育是一种比初等教育更复杂的有机体，在这一阶段学科分化和教师分化开始出现，更需要形成有统一性的基础，因此转型时期的中等教育就越需要反思（涂尔干，2006b）。

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急于重建复兴，教育的积极作用被广为认可。舒尔茨最先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是可以进行资本投资的，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教育方面投资越多，未来就越能收到回报。教育上的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个人价值，促进阶层流动，还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舒尔茨，1990）。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者认为，不论是通过职业教育或学校教育，都会提高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收益。尤其是经过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比起那些未受培训的人，他们被雇佣和获得更高工资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贝克尔，2007）。

然而到了 1960 年代后，欧美各国迅速扩张和增长的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导致大规模的学生反叛思潮，让人们教育的积极功能产生了质疑，其中最激烈的批判就是再生产理论。教育中的再生产理论者认为，学校教育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机构，中上层阶层的学生通过高等教育会成为精英，而底层阶层的孩子通过职业教育更可能会成为技术工人（Bowles & Gintis, 1976）。职业教育分化并阻碍了那些底层孩子获得平等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此外，从再生产理论中分化出来的抵制理论还认为，工人阶层的孩子并非由于服从或迎合这套统治阶级的制度文化而被再生产为工

人，而是由于他们拒绝这套中产阶级文化，因自己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而成为工人（Willis, 1977）。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左，但都假设职业教育和工业体系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人力资源理论强调教育中的培训和工作技能的对应关系，再生产理论则侧重学校教育和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背后所依赖的基础是西方成熟发达的工业体系。实际上，一些比较研究指出，职业教育会对学生的工作获得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一国的教育体制、雇工类型和经济组织等多重因素有关，而不能一概而论（奥沙利文，2007）。如美国就缺乏系统培养劳动力的方式，反而有很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升入高等教育学校，很少进入职业技术学校。而在德国，学生中学毕业后则更多是进入著名的学徒制体制。德国企业对正式资格的学生要求很高，但他们对未来管理人才的选拔并不完全依赖大学教育，而更多依赖学徒制培养的学生。德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其一由各种职业教育学校构成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其二由企业生产现场及各种训练工场等训练设施构成的校外职业教育体系。前者通常由各种全日制的职业教育学校承担，后者通常由部分制职业学校与之配合构成双重职业训练体系，是职业教育的主体”（孙祖复、金铨，2000）。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与校外职业教育体系各有自己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各自都有相关的法律所保护。而在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上，具有古老传统的手工业师徒制训练方式对后来近代德国职业教育形式有深远影响。正是在这一传统下，近代兴起的由若干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建立工业企业校外培训方式，能够成为与国家行政管理主导的学校教育相抗衡的另一类重要的职业教育体系。

可见，一国形成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和所处的制度环境、经济结构有着紧密的关联。德国和美国所形成的不同的教育类型也说明了这一点。反观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体系还很不发达，教育体系发育得也不成熟，教育和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对应性和协调性也有所欠缺，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在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下，国内在学科重建和教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吴康宁，2009）。对本文所研究的职业高中而言，如下的教育现实和相关研究值得注意：自2001年起，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县为主”的税费改革（周飞舟，2004）直接导致了地方教育格局发生的连锁反应。税费改革之后，以前“以乡为主”的财政负担转移到“以县为主”。虽然农民的负担缓解了，但因县城财力有限，政府只能精简教学机构，合并乡村小学，清退民办教师，导致村办学校大量关

闭。合并后的小学逐渐“学校上移”（熊春文，2009），导致乡镇或县城的中心小学中小班级规模严重超编，师生比例失调，城镇教育质量严重恶化。就本文田野调研情况来看，当地村小的合并和中心学校的超编不仅影响了基础教育，也影响了当地的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城镇中小学超大班额的教学压力又逐渐转移到高中学校，加上县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二元分类，因城乡中小教育质量下滑而出现的大量学困生，最终都会进入职业高中，给职业高中的培养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此外，教育与公平的相关研究指出，目前农村子女在高等学校入学、职业获得、阶层流动中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教育扩张不仅没能促进个体流动，反而加速了这种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杨东平，2006）。李书磊曾把乡村社会中的学校称为“村落中的国家”，学校成为农村子女主要的上升流动渠道（李书磊，1999）。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乡村中小学校的合并，地方教育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动，在当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乡村衰落的局面下，这些乡村学校已经大量消失，改为以乡镇或县级为中心的“中心学校”，完全打破了原来以村队为单位的小学设置，引起农村中小学在师资配置、学生食宿等各方面的变化。在乡村教育逐渐衰落的背景下，加上教育资源在区域、城乡分布上的不均衡，农村子女想要通过乡村学校获得上升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样，职业教育在地方社会就成为学生向上流动的另一个希望了。职业教育在目前是否能够给学生提供一条不同于普通教育向上流动的方式呢？这需详细考察。

根据上述研究，教育与社会伦理、职业分层、政治经济制度等有着良好的协调关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起着整合、分流和再生产的作用。而教育的这些作用发挥得如何，与教育体系是否能与所在社会经济体系相匹配高度相关。而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诸系统之间关系的协调性较低，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种种现实困境。本文通过分析职业高中所处的教育体系和经济体系的结构变迁，说明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及其功能异化的事实。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单位的选择

自20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田野研究中，兴起了不同研究单位的选择和

分析范式。狄金华（2009）梳理了已有的村落、集市、乡镇、县域四种模式，不同研究单位的选择对应不同的农村分析范式，进而也会拓展对农村社会新的研究。杨雪冬（2006）尤其将“县”赋予了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在他看来，“县”在中国社会地理文化、区域市场、行政层级、政治系统中位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层级。基于本文的田野材料来看，本文选择县级的职业高中作为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从研究问题和文献梳理来看，这样的选择还有学术意义上的考虑。

在1980、1990年代，随着乡镇工业的繁荣，在商品流通、就业安置等多方面，地方社会维持着以“乡镇”或“村社”为单位的基层生活生产的地域模式。但随着乡镇工业的衰落，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逐步衰落，家庭教育、就业方式、地方风气等由此发生重要变化。同时，自2001年以来以县为主的财政改革深刻改变了地方原有的教育体系，“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乡，高中不出县”的教育经费负担模式，从以前以“乡镇”为单位转移为以“县”为单位负担。由于县城财力有限，加上农村的衰落，之前“以村为主”的乡村小学大面积关闭，逐渐“上移”到乡镇或县城“中心小学”（熊春文，2009），这在田野地和全国都非常普遍。

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乡村衰落这种地方社会深刻变革的形势下，遵循社区研究范式的乡村学校研究（李书磊，1999；曹诗弟，2005），再试图通过对乡村小学的研究去探讨地方乃至国家更整体的问题就很难实现了。研究乡村教育，有必要重新调整研究单位的选择。此外，目前这种以乡镇或县城“中心小学”为基础的地方教育体系，使得初中、高中的布局和特性都随之发生重要变化。因此要理解地方教育的困境，不仅要注意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中的联动情况，还要看到教育体系的变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行政税费等因素之间的关联。从田野情况看，要理解职高悖论的现实，就必须跳出职高校园，关注当地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

（二）研究材料的收集和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收集相关材料。笔者曾于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在案例学校支教一年，其间参与学校的教学管理，访谈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收集了一手材料。而后，笔者于2011年暑假重访该地，收集了如下文件档案和统计材料：1980-2011年该县教育领域重要改革的文件、会议、报告；1980-2011年该

县高、中、小学每年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2000 - 2011 年该县教育系统有关安全管理政策文件等。此外，笔者实地调查了学生实习的南方工厂，深入了解该工厂内众多职业学校进行的“顶岗实习”活动。这些材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材料。

根据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单位选择以及研究思路，本文基于一所县级职业高中的田野材料，试图把职业学校面临的招生升学和培训实习的困境置于宏观的历史制度背景和微观的学校运作机制之中，分析其所处的教育体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变迁，从而逐步形塑了当下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困境。

四、转型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的异化困境

我国职业教育早在近代洋务派开办的“实业教育”中就已有引入。民国时期，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改称为“职业教育”，并将西方系统的职业教育理论引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技术学校、职业高中等职业学校在 1950、60 年代初期曾有过大量发展，后来在“文革”中职业高中又被撤销。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提倡办职业教育，大批普通高中陆续又改建为职业高中。尽管国家一直努力改革，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基础依然薄弱，尤其是作为职业教育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其困境和问题尤为明显。

H 县职业高中成立于 1983 年，迄今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而这 30 多年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虽然是深处大别山区一所普通的职业高中，但其各阶段的职业定位与社会经济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所职业学校，既处于教育体系中，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环环相连，又要直面市场的变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相协调。目前，这所职业高中既不以考生升学为重心，也不以技术培训为重心，反而以“安全管理”为重心，这一悖论事实凸显了当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招生、教学和就业上的困境。学校如此重视安全管理，一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要，二是为了满足工厂的需要。家长满意，才能送孩子到该校，学校生源才能保证；工厂满意，才能接收本校学生去实习，学校才能维持实习就业的渠道。招生和实习的问题，二者的链接点是学校的内部管理。尽管按校长所说，这种安全管理赢得社会广泛认同，学校风气也逐渐形成，学校看似运转很“协调”，但这恰是一种“异化”困境的表现。

（一）职业高中与教育系统关系的历史考察（1981 - 2011）

职业高中这种学校类型是在改革开放后，由普通高中改办而成的一种中等职业学校类型。仅就与教育系统的关系来说，职业高中的发展深受普通教育体系和地方教育格局的制约。

1. 职普并置的历史和制度根源

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指出：

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要使高中阶段的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可适当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经过调整改革，要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在整个高级中等教育中的比重大大增长。^①

改办后的职业高中如何协调职业部分和高中部分的关系，关系到职业学校发展的方向。1983年，H县“城关高中”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办为“H县农林高中”，改办后的职业学校在招生、学制、教学、就业等方面，是如何设置的呢？又如何协调职业部分和高中部分呢？

“城关高中系我县调整中学布局后保留的一所三年制普通高中，原定每年面对城关镇招收新生两个班，面对县南的七个公社招收新生两班，在校学生共计十二个班六百人。这里有学农基地二十五亩，荒山十亩。聘请兼职教师也方便。计划从今年秋季起，改办为H县农林高中，学制、规模、招生范围以及经费来源等都不变。即每年面向本片七个公社招收初中毕业生两班，一百人，办成农林专业班；面对城关镇招收初中毕业生两班，一百人，办成职业技术班。前两年百分之七十时间学习高中基础课，百分之三十时间学习专业课，第三年

^① 人民网（法律法规库）：<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80/112701198003.html>，访问时间：2012年4月15日。

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学习时间各占百分之五十。学生毕业后不包分配，可参加对口的高等院校或回社、镇就业。”^①

可见，从1980年中等教育改革开始，国家就意识到办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也按政策积极改办当地的职业学校，但从一开始，职业高中就是在普通高中的基础上建立的，仅仅是在班级名称和课程名称上改为职业的称谓，不论从招生、学制、课程，还是从就业上来看，都没有实质性地展开，实际上依然是普通为主、职业为辅。

1987年，学校校名从“农林高中”改为“职业高级中学”，学校的课程不再限于农林类，还增添如建筑、电子等课程。虽然学校的职业课程范围扩大，但仍不是完全的职业学校。1993年，学校改为“H县职业高中（中专）”，正式设立“H县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实行一套班子，两块校牌。中专的设置，标志着学校的职业办学正式从普通高中脱离出来，成为学校中独立的一部分。中专部分，学制三年，毕业后不包分配^②。从这一年起，该校增招职业中专3个班，共128人，开设宾馆服务、电子、计算机等应用课程。虽然从1993年学校单独设立了职业中专班，但从人数规模和学校重视程度上来看，高中班升学仍然是学校的重点。如1994年秋，全校共14个班，771名在校生，高中部分的对口类升学班达到9个班523人，而中专班只有5个班244人。中专部的学生数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不到。从实际情况看，学校依然重视的是高中类升学，而不是职业培训。

“农村职业高中，生存的维持还是要要有升学，在实训设备、技术方面都达不到的话，完全抛开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特别是落后的农村职业教育，师资、实训方面都差一些，职业学校必须有一定的升学，若要放弃了，孩子们都不来了，马上就垮了，就没戏了。我们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以升学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升学，就这两块发展是兼顾的。”^③

这位学校领导的话，道出了农村职业学校办学的困境所在。在职业培训的硬件

① H县教育局，“关于改办普通中学为农林中学的请示报告”，1983年3月21日。

② H县教育局，“关于建立H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通知”，1993年7月20日。

③ 张文德教师访谈，ZWD20110806。

及就业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抛开升学，学校是无法生存的。即使在 1990 年代后，学校不断新建校舍，也有专门的职业班，但职业部分，仍然不是学校的重心所在，普通高中班的升学依然是学校的生命力所在。这种普通和职业并置，并且“职业”依附于“普通”，升学和就业并进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直到今天，在学校的实际工作分配中，“高中部抓学习，中专部管纪律”依然是大家的共识。

这种在“普通高中”基础上改办的“职业高中”，从一开始可谓“先天不足”，始终摆脱不了普通高中升学模式的体系。而德国的职业培训体系形成过程中，近代兴起的工业企业等校外培训方式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是由若干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建立的，并受法律严格保护。相比之下，转型时期我国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受限于原有的高中升学体制，并且延续至今，这是我国职业教育一直薄弱的历史和制度根源。

2. 竞争招生的兴起和现实后果

(1) 从“划片招生”到“竞争招生”

1981 年，H 县针对“文革”后的教育秩序混乱状况进行教育布局调整。至 1982 年调整结束，全县共有普通高中 4 所，初中 33 所^①。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决定建立城关高中，把普通学生分流到城关高中，把优秀学生留在重点高中，从而突显县重点高中的升学优势^②。虽然“城关高中”后来陆续改为“职业高中”，但该校的招生范围和规模却一直延续最初城关高中的招生片区。

1982 年，该县根据各社队的经济、文化和人口等情况，把全县 17 个社镇划为四片，每片设一所高中，共四所高中，两所县城高中，两所乡镇高中，各校划片招生，既方便学生入学，又能规范招生秩序。县重点高中则独享优先的招生和资金政策，每年最先招收全县中考成绩前三分之一的学生。李乡高中面向该县西北几个乡镇招生，刘乡高中面向该县东部几个乡镇招生，城关高中面向县城郊区和南部招生，这样在层级上全县形成一所重点高中和三所普通高中的格局。这种高中格局一直延续到 2000 年左右，维持约二十年。

1998 年，国家进行新一轮的改革。高校扩招、以县为主的财政改革（周飞舟，

① H 县教育局：“关于调整农村中学的请示报告”，1982 年 4 月 3 日。

② H 县教育局：“关于重点高中、城关中小学布局及扩建校舍的请示报告”，1980 年 5 月。

2004) 以及中小学合并 (熊春文, 2009) 给地方教育体系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自 1997 年至 2007 年, 十年间 H 县乡村小学减少 14 所, 班数减少 162 个^①。农村中小学合并, 一方面造成农村学校人数减少, 师资缺乏, 农村教育衰落; 另一方面带来县城学龄人口增加, 入学压力增大, 超大班额教学。2004 年, 该县小学平均班额 77 人, 初中平均班额 80.4 人, 高中平均班额 66.5 人^②。超额的学生使县城学校不得不扩大学校规模, 但此时县城正进行财政改革, 财政吃紧^③, 政府只好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办学。民营资本虽缓解了当地办学压力, 但不正当的竞争同时也打乱了当地原有的教育秩序。

龙远公司是该县目前最大的民办办学机构。目前公司所辖的四个民营学校, 在全县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同级学校中均是最具实力的。这四所学校都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 由政府支付教师工资, 并在招生和资金上给予支持。该公司就此节约大笔经费, 并在全县各中小学和高中挖掘优质教师和学生。这对当地正规的公办教育机构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2007 年, 龙远公司建立高中分校, 官办民营, 利用县高名声和民营资本大力招揽学生, 造成县高分校抢职高生源, 职高抢下边乡镇高中生源, 导致乡镇高中日愈难办。

表 1 H 县三所高中 1997 - 2010 年招生数的变化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县 高 中	344	352	373	420	601	959	1102	1321	1485	1574	1637	1427	1680	1750
职 高	409	491	500	610	827	717	947	1184	1298	1587	1613	1200	1308	1338
李乡高中	137	108	132	125	100	120	110	90	75	60	78	60	20	50

数据来源: H 县教体局 1997 年至 2010 年教育指标数据报表。

表 1 所示为县高中、职高和李乡高中三所学校从 1997 年到 2010 年的招生数统计。从中可见, 第一, 这三所学校的招生数, 在 2000 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 增长不

① H 县教体局: “关于县城学校布局调整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2004 年 8 月 6 日。

② 同上。

③ 如 2004 年, 县级财政收入 5054 万元, 仅教育投入就达 5886 万元。数据来源: H 县人民政府“义务教育报告”, 2005 年 10 月 11 日。

多，这归于划片招生的维持；第二，从2001年开始，县高中和职高的招生数都不断增长，其中职高的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县高中除在2008年有所减少外，也不断增长。然而李乡高中的招生数从2001年开始大幅减少，至2009年仅招20人。由于生源不足，该校2011年被迫关闭。另一所乡镇高中则勉强存在。李乡高中的关闭，县城另两所高中的学生数的增加，主要是中小学合并，导致大量学生涌入县城，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的结果。

乡镇高中和职业高中，在划片招生时还能保证稳定的生源，现在随着招生格局的变动，在竞争招生中已无法保证生源。可以说，该县自1982年奠定的高中划片招生格局，在维持了约二十年后，就此被打破。当然，地方教育格局的变动导致当地教育的秩序混乱，仅是一个宏观的制度背景，在这种变化下究竟什么样的学生会进入职业高中，给职业高中带来什么影响，具体的微观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呢？

（2）分流和筛选后的学困生

2007年，县高分校建立，直接威胁职高生源。为稳定生源，经上级同意，学校自2007年3月始，每年实行春、秋两季招生。学校在中考前3月份在全县各初中宣传，告知学生春季提前入职高，不需参加中考，入校后既可学技术，也可考大学。哪些学生会愿意不参加中考而提前进入职高呢？

“每年学校的人会下去招生，把简章发到各校。每个中学初三8%的名额，县城中学学校人数少些。这些学生基本都是学困生，基础差，行为习惯差，若中考的话，总分645分连200分都不到。家长多在外面打工，孩子太小，打工不合适，就放到学校，混年龄，只要不出事，不违纪就行了。”^①

尽管会有家庭教育缺失的因素，但学生所处的教育分流机制，更加重了这种后果。对农村中学而言，虽然优秀的学生和师资被民办学校抽走，但学校为了生存，仍要维持中考升学，就只能在剩下的学生中再次分快慢班。尤其到初三，中考升学的压力使学校紧抓快班学生，不管慢班学生。这些占多数的慢班学生，本来基础就不好，初三又遭分班，无人督促，更是心灰意冷，四处玩闹，或外出上网，或打架违纪。初中老师不想管，也管不住，此时正盼着职高能赶紧招收这些学生。这些学

^① 教师顾远华，访谈编号GYH20090324。

生也因担心考不上高中，愿意提前进入职高。

可见，这么多提前被招收的学生多是学业不良的学困生，很多还是留守儿童，这和当地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有很大关系。据统计，2005年全县外出务工半年以上的劳动力有120837人，占总劳动力240352人的50.3%（H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09：238）。当地常年一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大量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该县中小学留守儿童达35%^①。这么多留守儿童，都于1990年后出生，从小无人照看，贪玩打闹，学业不良，初中毕业后，年龄还小，家长又不在，只能去分数低的职高继续上学，待在学校不出事就行。

职高3月份的提前招生，大约能招6个班近400名学生。这些学生进校后统一被编为中专春季招生班，而不是普通高中班。实际上，春招班无任何统一的教学计划和督导，老师讲课随意，主要精力都花在对这些学生的管理之上。春招学生被老师称为“小学的水平，幼儿园的纪律”，他们完全昏睡玩闹三个月，到9月份被正式编为中专班。中专班既无正式的教学计划，也无职业培训，只是每日强调纪律安全，只要不出事就行，成绩都无所谓。2007年始，中专班每年组织学生去东南沿海工厂“顶岗实习”，但学生逃离率和流失率非常高。可见，职业高中的春季招生和工厂实习并未给这些学生提供实质的职业培养。

上面所谓的春季提前招生，仅从2007年才开始，并且所招学生数量少，都集中在中专班，而每年中考后的秋季招生仍是学校生源的主要来源。地方教育格局从“划片招生”走向“竞争招生”，职业高中也从面向城南和城郊的片区招生转向面向全县的竞争招生。此招生格局的变化又进而影响了职业高中的升学和内部管理。县高有优先招生的政策，职高仅有优惠资助^②和低分政策的优势。这对那些分数靠后的学生而言极有吸引力。以2007年招生为例，该校当年招生1550人，高中班20个1200人，中专班5个350人。其中高中A层班4个，这是学校升学的主力；高中B层班15个，多数是全县中考成绩1200名以后的学生，是学校生源的主体。高中C层班1个，是中考成绩最差的学生，也是全校最难管的班级。

① H县教体局：“全县中小学安全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2007年11月14日。

② 该职业高中为吸引优质生源，承诺中考成绩前800名的学生，到职高后可免学费和住宿费，并被编入重点A层班，配备优秀师资，重点培养。且自2007年始，国家规定每个职业学校学生可享受每人每年1500元的国家补助。

通过优惠资助和低分政策以及提前招生的办法，职高每年能维持 1500 人的招生，在校生 4500 人左右的规模。不过虽然生源数量维持了，但这 1500 名学生大部分是中考成绩靠后，被县重点高中优先筛选后的学生。在中小学学业就很差的学生，一入职高校门又被分流。学校主抓 A 层班，B、C 层班则又被边缘化，出现“A 层班管学习，B 层班抓有效学生并管纪律，C 层班主管纪律”的实际分工。自 2007 年后，县高分校建立，依靠强大的民营资本，也大力资助学生，并降低分数线，以前职高 A 层班水平的学生也被招走，职高的优惠政策优势也逐渐丧失，升学希望更加渺茫。故现在进入职高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中考成绩靠后的学生，更降低了职高已经低下的升学率。

表 2 H 县 2003 - 2010 年全县、县高、职高本科过线率变化统计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县	23.04%	21.71%	17.57%	37.09%	39.49%	44.50%	42.06%	54.35%
县高	43.41%	34.41%	41.35%	50.03%	52.41%	55.89%	48.77%	61.82%
职高	23.99%	20.56%	18.92%	12.38%	11.54%	18.85%	9.69%	14.03%

数据来源：H 县 1998 年至 2010 年全县高中升学统计报表。过线率为本科过线人数与报考人数之比。

由表 2 可知，从 2003 年至 2010 年，全县平均升学率从 23.04% 增至 54.35%，县高升学率从 43.41% 增至 61.82%，二者除个别年份下降外，一直不断上升。然而与之相反，职高升学率并未随高考扩招及全县平均升学率的增长而增长，反而不断下降，从 2003 年的 23.99% 降至 2010 年的 14.03%，除 2008 年有所反弹外，一直持续下降，2009 年降至最低点 9.69%。2009 年，职高高三考生共 1362 人，过本科的只有 132 人，该数据还包括两个复读班的学生。这意味着，应届生的升学率还会很低。如此看来，每届约 1300 名考生，过本科线的不到百人，90% 的学生实为升学无望。

这样看来，这所职业高中目前要面对这么多已经被正规教育制度分流和筛选后的学生。他们从小随父母在外漂泊，贪玩打闹；在学校阶段又被分流筛选，逐步丧失学习信心，而升学又无望。他们年龄还小，家长不在身边还希望有人管管，就只能先送学校，把管理教育的任务推给学校。学校在招生不利、培训不利的局

面下，又无法把学生推向当地，就更难解决这些孩子的出路，只能以严格的纪律管教，这样还能使家庭、企业比较满意。学生学不进，就只能一起抽烟、上网、打架。学生的违纪，又迫使学校只能更加强化学生管理，乃至以暴制暴，恶性循环。

由上可见，基于普通高中基础上改办的职业高中，在历史和制度根源上就受限于高中升学模式，这在职业教育改革之初，就已形成，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自2000年以来，地方教育体系发生变动，中小学合并和民办办学导致农村教育的凋敝和县城教育的拥挤，这种两极分化的教育现实，瓦解了以往稳定的高中片区招生格局。在新的竞争招生形势下，职业高中在教育分流机制中自2000年后逐步招收的是全县被分流、被筛选的学困生。生源质量的恶化，不仅降低了学校的升学率，也给职高的风气和管理带来了难题。

（二）职业高中与外部经济结构关系的历史考察（1981 - 2011）

上面的分析说明了教育体系如何限制职业高中的职业发展，而职业高中除与自身所处的教育系统有关联外，还受到外部经济结构的影响。外部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关系学校培养的人才能不能“送出去”的问题。对于无法走普通升学道路的学生来说，职业教育对他们非常重要。那么，职业学校是如何开展职业培训和实习就业的，能否给学生带来另一条出路呢？本节考察了自职业高中建立以来，外部的经济结构对职业高中实习培训的影响。

1. 从“面向农村”到“面向工厂”

1983年，H县政府响应国家号召，提出当地教育要“面向农村”，故把“城关高中”改为“农林高中”，开设农林类专业课程。但改办后的学校在学制和规模上并无太大变化，只是在第三学年才增设专业课程，前两年皆主要学习高中基础课，实为普通为主、职业为辅。1990年代，随着当地乡镇企业衰落，农民外出务工，学校的职业定位转向“面向市场”，增加中专单独学制，开设工业建筑、导游、保安、数控机床等多个专业，但因师资设备有限，基本无力开展，中专培训流于形式。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新一轮改革开始，我国逐渐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 and 国有企业并列的二元产业结构（Baek, 2005）。东南沿海的中小工厂，由于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普遍缺乏工人。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①，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 10% 左右。其中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在此背景下，2005 年 10 月国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最后一年要去企业“顶岗实习”。恰好该时期，我国的职业学校已无法立足当地发展，学校的职业定位转向了“面向工厂”的“顶岗实习”模式。

实际上，从 2003 年民工荒开始后，国家就有意识地发动职业学校开展“顶岗实习”活动，并明确提出职业学校向“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转变，以此来应对东南沿海工厂的民工荒问题。但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和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技术学校与所属工厂企业推行的“半工半读”模式迥然不同。此前的技术学校是直属某些国有企业的，在师资、实习、就业方面都能很好地协调。而现在“校企合作”中的学校和企业完全是不同的系统，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这样如何在学校和工厂中实现合作呢？此外，东南沿海劳动工厂所形成的工厂体制（任焰、潘毅，2006），需要能承受高强度、低工资的劳工，而目前职高学生皆 1990 年后出生的，他们已无法像父辈那样能承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一方面是工厂劳动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孩子并不愿像父辈那样出去受苦。在此背景下，工厂实习如何开展，学校的教导管理如何与工厂要求相适应，就成为职业学校在工厂开展“顶岗实习”活动要解决的问题。

2. 校企合作下的“顶岗实习”

这几年与 H 县职业高中合作的是一家名为“圣为”的台湾独资企业，主要做模具、机床等方面的业务。该企业在所在市区有新老两个制造工厂，各 1 万人。比起老厂，新厂有一个代产笔记本外壳业务，如 NB1、NB3 部门。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只需简单机械操作。从各地职业学校来的“顶岗实习”的学生主要在新厂的这两个部门工作，学生人数能占新厂工人的一半，达 5000 名。该工厂的员工招聘委托一个名为“伊克斯”的中介公司操作，该中介公司从社会上招社会工，从学校里招学生工，源源不断将劳工输送到工厂，并在工厂中负责管理社会工和学生

^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09/08/content_1957487.htm，访问时间：2012 年 12 月 10 日。

工。这种通过中介公司，实行学校与工厂合作的方式，广泛存在于东南沿海中小企业以及众多职业学校之中。工厂选择中介公司主要考虑什么因素，中介公司选择学校又会考虑什么因素呢，这三者之间如何运作？

问：工厂选择劳务公司考虑什么因素呢？

答：“它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人数吧。就是说，我要要人，你随时来给我供应多少。因为工厂它不能停产，如果说我要忙的时候，你给不了人数，耽误我活动，它赔大了，首要的是人数，要人的及时性。”

问：中介公司拓展哪些学校，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答：“扩展考虑的一个就是，可能条件比较差的这些，或者比较穷的那些地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能吃苦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它选择那种一下子能够提供人多的一些学校，人多嘛一次性，他就免得经常出去嘛，节约成本。第三个可能从经济方面考虑嘛，尽量就是说给学校能够少给一点给一点。反正现在就是说，不是我们学校求企业，而是企业求学校。”

问：那学校又选择什么样的劳务公司来合作呢？

答：“我觉得学校最大的考虑是利益，看哪个中介公司能多给点。因为学校领导他们对这个厂究竟了解多少呢，他肯定不怎么了解。其实员工的生活、饮食、工作情况，都是通过别人的口里说出来，校长就没有在那待一天。”^①

可见，工厂选择公司，公司选择学校，学校选择公司，三者考虑最多的是人数与利益，而非实习是否与学生专业对口，是否有利于学生技能提高。对工厂而言，最缺的是劳工，最关心的是能输多少学生工；对学校而言，首要考虑的是利益，不管学生专业是否对口；在学校和工厂之间的中介公司，关心的是学生数量，学生忍耐力及自己的利益。下面是笔者所了解到的参与该工厂“顶岗实习”的职业学校名单和参与情况。

^① 教师王雷，访谈编号 WL201107013。该教师多次带领学生外出“顶岗实习”，驻守工厂，负责学生在工厂的所有事宜。

表 3 H 县所在市辖的各职业学校在该工厂的实习次数、人数统计

H 县所在辖职业学校	L 县职高	S 县职高	G 县职高	B 县职高	市六职高	市技校	H 县职高	市职高
实习次数	一次	一次	二次	二次	三次	三次	三次	三次
每次人数	100	150	150	100	300	100	200	500

表 4 H 县所在省以及其他省各职业学校在该工厂的实习统计

H 县所在省辖职业学校	郑州医学院	驻马店上泰职高	鹤壁市威龙电脑学校	汝阳职业教育中心	洛河食品学院(七次)
其他省职业学校	云南经贸学校(六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江西大宇学院	山东菏泽石油化工	甘肃天水红砖

注：上述两个表格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1 年 7 月 10 日为止。

从以上两表可知：第一，职业学校绝大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学校，没有东南沿海的学校，说明中介公司多会选择偏远地方的职业学校。东南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多，当地的职业学校学生就在当地实习，不会去其他省份；第二，职业学校来自江西、甘肃、河南、云南等多个省份，涉及医学、电子、食品、化工等多个专业，但不论什么专业，到工厂后都做笔记本外壳方面的机械劳动工作，和专业没有关系；第三，就 H 县所在市的职业学校来说，几乎大部分职业学校都多次派学生参与该工厂顶岗实习，这是因为中介公司的招聘人员，一般会先到市教育局做公关，再由市教育局动员下面区县的职业学校参与。

就具体利润而言，在学生的工资条上，有一栏叫“学校代扣”。学校会从学生的工资中扣钱，各学校每月代扣从 50 至 100 元不等。若按每月每人扣 50 元算，实习一期 4 个月每人就扣 200 元，一期学生按 200 人算的话，4 个月下来，学校扣款所得即 4 万元。此外，学校每输送一个人，中介公司会给学校 300 元。一期若派 200 人，中介公司给学校即 6 万。这样，一次顶岗实习活动，若去 200 名学生，学校至少可得 10 万元的回报，且不付出任何成本。对工厂而言，以低廉的学生来顶替短缺的工人，且不承担任何福利保障，也是获利颇丰。这样看来，“顶岗实习”对于工厂和学校，可谓“双赢”。

3. 工厂劳动中的“学生工”

在目前“民工荒”的背景下，学校、工厂和劳务公司利用国家“顶岗实习”政

策，把广大学生送到工厂，作为廉价劳动力派遣和使用。在这种机制中，工厂如何使用学生，实习又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工厂，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劳工：正式工、社会工和学生工。正式工按法定程序与工厂签订劳工协议，集中在冲压、模具、车床等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部门，人数少，待遇高，福利好。社会工是从社会上招聘的劳工，集中在 NB1、NB3，或者印刷车间这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的岗位工作简单机械，强度大，待遇低，很多社会工不愿意干，“民工荒”就出现在这些部门。为补缺劳工，工厂通过中介公司拓展学校业务，招收职业学校的学生来工厂“顶岗”。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多所大中专职业院校，以及技校和职高这类中等职业学校。工厂为何倾向大量使用学生工？是否会觉得学生在知识上、技能上、纪律上有突出的地方？

“这个不，这个主要原因是社会工比较难招。我们学校一搞就是 200 多个人。像那个洛河食品学院他们，一来就五六百，像市职高你看，一来也是五六百，所以它开发学校这方面有这个原因。第二个，学校还有老师在这，还可以帮他管理。出了问题，学校老师都有责任。圣为（台湾企业）把风险嫁接到伊克斯（专营员工招聘的中介公司），伊克斯再和学校两个联姻，风险和学校两个共担。学生出事肯定找学校，找伊克斯是吧。”^①

可见，工厂选择使用学生工，主要是因为现在社会工难招，学校大量学生可以弥补。拥有充足劳工，保证生产线的运转，对工厂而言是最重要的，而不管学生的专业、学历和技能是否对口。按国家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后，最后一年出来实习，但实际上许多职业高中或技校的学生，刚初中毕业进入职业学校没几天，就被直接送往工厂。他们的年龄很多不满 18 岁，因受不了工厂高强度劳动，大量离职。

初到工厂，学生最不适应的，一是超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机械的重复劳动。在工厂中，学生经常要加班至零点，乃至有些还要上夜班，加上长时间身处弥漫着化学刺鼻味道且轰鸣的车间，学生对工作环境和强度很不适应。初来工厂，每天七八个学生请病假，两个月下来，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有生病请假。另外，学生

^① 教师王雷，访谈编号 WL201107013。

每天都要重复同样工序，如在生产线上连续数月安装螺丝，十分枯燥。实习一个月后，学生离职出现高峰。尽管工厂和学校双方对学生离职都很不满意，毕竟少一个学生，少一些利润，但对学生而言，实在无法忍受工厂劳动，许多学生坚决返校或回家。

就 H 县职业高中而言，2009 年至 2011 年连续三年，学校先后三次送学生去圣为工厂顶岗实习，每期 3 至 5 个月。第一次去 64 人，回来 55 人，9 人离职，离职率还较低，剩余学生实习结束后全部返校，无学生留厂；第二次去 250 人，回来 125 人，125 人离职，离职率较高，达到 50%，实习结束后 12 人留厂；第三次去 222 人，回来 138 人，76 人离职，离职率达 34%，实习结束后 8 人留厂。相较县城职业学校，市里的职业学校，如一些大中专院校和技校，离职率更高，如 H 县隶属的市六职高，学生大多是市里的，其离职率一直处于 50% 左右。可见，职高学生并不适应这种劳工体制。

对于学生而言，虽然工厂劳动辛苦，但工厂并不像学校那样管教严格，至少在劳动时间外，学生还可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同时还能自己挣钱，自主消费，所以实习结束后，个别学生会选择继续留厂工作，或在外闯荡赚钱。几个月的实习让学生短暂地接触社会，也让他们很难再收心回学校。学校的生活本就枯燥无味，外出实习的学生，无论中途离职，还是结束归来，大多在下学期退学了。原来一届三百多名中专生，三年后不到百人，老师也无心教课，应付了事。可以说，顶岗实习实际上打乱了中专的教学秩序，不顾学生的成长，实际为了学校和工厂的利益。

由上考察可见：第一，目前在全国各职业院校推行的“顶岗实习”模式，是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工短缺的背景下产生的。广大学生是被送到工厂，被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而非职业教育体系和经济体系良好适应的自然结果；第二，工厂、中介和学校三方合作时，所考虑的主要是人数和利益，根本不顾及学生学历和专业，无论哪种专业的学生都从事笔记本外壳加工这种简单机械劳动；第三，学生初到工厂，被迫加班加点，出现较高离职率，说明他们并不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因此，所谓“顶岗实习”的“顶岗”，只是顶替工厂大量缺乏的劳动工人，保证工厂的持续生产；所谓“实习”，就是让职业学校的学生到工厂学习实践。“顶岗”为实，“实习”为虚。“顶岗实习”和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并无任何关联，也并未给学生带来很好的职业出路。

五、分析与结论

本文所分析的案例反映出，“职业高中”的学生既升学无望，又无法适应工厂劳动，学校在高中升学和职业培训上都逐渐陷入困境。进入职业高中的学生本身基础就差，习惯贪玩打闹，进入职业高中后，依然没有合适的出路，只能天天在学校里打架斗殴。家长外出务工，不在孩子身边，把管理教育的任务推给学校，而学校在升学和实习不利的局面下，更难解决他们的出路，只能严格管教。学生既无企业接纳，也无家长监护，职业高中就承担起管理这些大量学困生的重任，逐渐形成了以“安全管理”为重心的异化境地。

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发现，这种中等职业教育的“异化”事实是在转型时期，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经济结构和地方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的变迁相互作用形成的。这一事实说明，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和所处的教育体系及外部的经济结构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而当前这种中等职业教育的“异化”事实既不能用计划经济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的特质来描述，也不能用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来解释。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已有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三种办学形式。但这一时期的中等职业教育所呈现的特质与改革开放后兴起的职业教育有本质的差别。在计划经济时代，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隶属于国家部委或者国有企业管理，其招生、办学、管理、就业深受国家计划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这两类职业学校仍旧直属部委企业管理，直到1998年国家新一轮改革开始，才从国家部委、国有企业的隶属下逐步脱离，归于地方省市管理（杨金土，2002）。而此后，曾依赖于国有企业或国家部委直属管理的技术院校，在归于省市管理后，也和职业高中一样，没有直属企业的依托，都要面对市场经济的变动，都要面对普通高中升学的牵绊，都要到东南沿海的工厂去“顶岗实习”，都逐渐出现招生教学和实习就业上的困境。与之相比，职业高中在1950、1960年代初期虽有发展，但随后因“文革”被迫撤销，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大批普通高中的基础上改办为“职业高中”。改办的职业高中不享受国家“统分统包”的政策，没有直接所隶属的企业，比起职业中专、技术学校，从一开始就缺乏国家计划的保护，也缺乏地方企业的依托，也最容易受市场环境波动的影响（杨金土，2002）。因此，目前这三类中等职业学校，处于共同的教育体制和经济结构之下，都要面对招生和就业上的困境，一

定程度都陷入“安全管理”的异化境地。

其次，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并没有像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那样，和社会伦理、经济结构有良好的适应关系，没有产生出整合的社会伦理，没有形成与经济结构相应的职业流动机制，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另一条流动上升的道路，某种程度在地方上扮演类似“监狱管理”的角色。职业学校这种“安全管理”的异化现象是许多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学校在时代的变迁下并不是曾经乡村学校研究中所称的“国家象征”，也不是像普通高中那样承担为国家经济发展输送更高一级人才的功能。这类学校的运行机制也不能用西方“再生产”的机制来理解，因为职业学生是层层被筛选、被分流的，这种现实和所处教育体系的变动紧密相关。这些学生的境遇也不能简单用抵制理论所言的“反文化”来解释。因这些学生并不是主动反抗，主动放弃学习机会的，他们的命运受到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地方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他们的内心也是十分焦虑和无奈的。

本文所研究的这所职业高中是我国中部革命老区的一个职业学校，该地区没有大量企业，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如果当地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经过当地职业学校培训的学生能在当地企业工厂实习就业，至少不会出现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不会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学生也不会到外面去“顶岗实习”。当地的职业学校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或许能形成一种良好的协调关系，这些职业学生的命运也可能大不一样。受限于材料和篇幅的关系，本文没有进一步对比发达地区（如东南沿海职业高中的情况），不同地域的中等职业教育是否有明显的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奥沙利文，玛丽，2007，《公司治理百年——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黄一义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贝克尔，加里，2007，《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郭虹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曹诗弟，2005，《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泥安儒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狄金华，2009，《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H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09，《H县志（1986-2005）》，内部发行。

H县教体局，1995，《教育志（1783-1994）》，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李书磊，1999，《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任焰、潘毅, 2006,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舒尔茨, 西奥多, 1990, 《论人力资本投资》, 吴珠华等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孙祖复、金锵主编, 2000, 《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涂尔干, 爱弥尔, 2006a, 《道德教育》, 陈光金、沈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2006b, 《教育思想的演进》, 李康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吴康宁, 2009,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1979-2008)》,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
- 熊春文, 2009, 《“文字上移”: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杨东平, 2006,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金土, 2002, 《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大潮丛书: 职业教育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雪冬, 2006, 《论“县”: 对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分析》, 载陈明明主编《权力、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 2007, 《中国职业教育: 发展与挑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职业技术教育》第21期。
- 周飞舟, 2004, 《谁为农村教育买单? ——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改革》,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Baek, Seung-Wook 2005,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5 (4).
- Bowles, Samuel & Herbert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Shavit, Yossi and Walter Muller 2000,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tracking,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Maureen T. Hallinan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吴莹